

# 非传统安全外交的内涵、意义及类型

王梦婷<sup>1</sup>, 余潇枫<sup>2</sup>

(1.浙江财经大学 国际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浙江大学 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超越“伪多边主义”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中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点。作为中国外交方略的重要内容,非传统安全外交是中国外交超越传统安全困境的路径拓展。以和谐世界为目标导向,以共享安全为价值准则,以安全共治为实现路径的非传统安全外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中凸显了其特有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可能性和未来拓展性。非传统安全外交主要是各国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区域乃至全球的资源性安全困境,并合理地兼顾他者与自身的发展。基于中国的外交实践,非传统安全外交可分为结伴式外交、对接式外交及镶嵌式外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外交可以作为一种新路径来促进国家认同,通过结伴式外交实现政治上的和谐式建设,通过对接式外交进行经济上的互补性发展,通过镶嵌式外交拓展文化上的互惠性交流,从而尽可能消解国家之间利益的争端,化解文化宗教方面的矛盾。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外交;结伴式外交;对接式外交;镶嵌式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2)03-0090-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2.03.012

## The Connotation, Significance and Type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plomacy

Wang Mengting<sup>1</sup>, Yu Xiaofeng<sup>2</sup>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2.Center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 Peaceful Development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oday's world. The genuine multilateralism beyond pseudo-multilateralism is the value basis point of China's diplomacy i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strateg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plomacy is an extended path of China's diplomacy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plomacy, with harmonious world as its goal, shared security as its value base, and common security governance as its realization path, has highlighted its uniqu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realistic possibility and future expansion in the building of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plomacy is a way for countries to solve regional or global resource-based security dilemmas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to strike a reasonable balance between the other's and their own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收稿日期:2022-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ZZ107)

作者简介:王梦婷(1990—),女,博士,主要从事海外利益保护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  
余潇枫(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

diplomac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partnership diplomacy, docking diplomacy and mosaic diplomac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plomacy can facilitate national identity as a new path, achieve harmoniou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rough partnership diplomacy, fulfill complement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docking diplomacy, and expand reciprocal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mosaic diplomacy, so as to dissolve disputes ove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solv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Key wor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plomacy; partnership diplomacy; docking diplomacy; mosaic diplomacy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化全球治理的一种新探索,也是破解逆全球化潮流、促进全球化发展的最高价值选择,其主旋律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和合共生与和平共建。在21世纪的今天,用“去安全化”方略超越敌意化与对抗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事实上,相对“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策略或“伪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小圈子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世界各国更看重中国倡议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相互冲撞的时代,外交的价值基点不再仅仅是以“地缘政治”“地缘军事”为主要考量且以军事武力为后盾的“结盟外交”与分庭抗礼,而是更多探索以“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为主要考量的超越冷战思维的“结伴外交”与全面合作。与此同时,日益受各国重视的非传统安全外交将是新时期外交的重要内容,并将在深化全球治理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一、何谓非传统安全外交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错综复杂态势,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逐渐将“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议题置于优先地位。与这些安全领域紧密相关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除了从传统安全角度仍被重视外,也从非传统安全视角受到特别重视。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安全”在维护传统安全或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的非战争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通过形式与路径的非传统化以适应新的安全形势,如实施开设人道主义通道的特别军事行动、非军事武力的战争军事行动、非流血的非传统战争、应对

非战争威胁等。对于爱好和平的国家或不以军事武力为首选的国家,非传统安全外交越来越成为其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方式。

#### (一)非传统安全外交的界定

如何界定非传统安全外交?从外交演进的视角看,主要基于两种逻辑:一是外交领域细分意义上的理路,即从“外交—非传统外交—非传统安全外交”维度上的细分;二是外交内容拓展意义上的理路,即从“外交—安全外交—非传统安全外交”维度上的拓展,前者凸显“外交的非传统性”,后者凸显“安全的非传统性”,这两种逻辑理路的叠加,便形成了非传统安全外交的特定领域。

从外交史的角度看,外交曾经历了从传统外交向现代外交、秘密外交向公开外交的转型与拓展,而凸显“外交的非传统性”的非传统外交则是现代外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进一步提升与深化。赵可金认为,非传统外交包括:以政治化为特征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等;以专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外交”“司法外交”等;以社会化为特征的“城市外交”“媒体外交”等<sup>[1](P1-3)</sup>。有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外交在当前更多体现在公共外交方面,不仅“各国政府的公共外交和民间的公共外交形成互补”,而且“公共外交实际上属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sup>[2]</sup>。罗建波等则从大观念、大战略、大国责任三个层面探讨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创新与发展,提出超越传统外交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想<sup>[3]</sup>。因此,当具有创新性的外交形式与国家安全相关联或者直接围绕国家安全而付诸实践时,便进入了本文所探讨的非传统安全外交的特定研究领域。

从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演化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经历了从以战争为主解决冲突向以非战争为主解决冲突的历史性转型,而非传统安全外交则是传统安全外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进一步拓展与补充。传统安全外交多采用以军事化为特征的外交方式,如军事结盟、联合军演、国际军事谈判、国际军事援助、国际军工合作、国际维和行动等。而非传统安全外交则大大拓展了安全范围与合作形式,除了以军事化为特征共同应对非战争威胁的外交合作外,以非军事化为特征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网络危机”“资源危机”等外交合作,都可列入非传统安全外交范畴。当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非传统安全外交也往往介入军事化与非军事化相交织的领域,力求以非传统安全的方式,去消解传统安全方面的对立与紧张。

## (二)传统安全外交和非传统安全外交

如果说传统安全外交是零和思维与旧安全理念促成下的对抗性博弈,其结果往往会使各国陷入军备性安全困境,甚至可能会导致如用核武器以确保摧毁的方式来维持国家间的“恐怖平衡”,那么非传统安全外交是非零和思维与新安全理念观照下的“共建性和合”,其结果往往会超越资源性安全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共治”和“多元共赢”的目标<sup>[4]</sup>。在全球治理的多边合作中,非传统安全外交拒斥以“本国优先”,即以本国利益置于他国利益之上的“单边主义”,同时也拒斥以往的“霸权多边主义”“垄断多边主义”“小圈子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和“干涉多边主义”等,而力求探索一种真正的多边主义。

非传统安全外交通过多元多边主义而实现。鉴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国际间的多边合作,还是区域间以某种共同体方式的合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集体行动难题:谁来领导?谁来决策?谁来实施?如果共同推举的领导者掌握

一票否决权,那么所谓的“多边合作”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多边主义”,即“单元多边主义”;如果双边合作只考虑双边各自的利益,而不考虑双边决策对双边之外的第三方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溢出性影响,那么这种“双边合作”也只是一种“单元双边主义”。因此,真正的多边主义应该是“多元多边主义”,也就是一种人类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多边主义”,是一种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不持有特别的否决权的合作形式,体现的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追求的是多个国家合作基础上的“和合世界”,而不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合作中的“一个世界”,这正是非传统安全外交的国际价值与普遍意义所在。

如果传统安全外交的目标是共同防止战争的发生与应对战争的威胁,那么非传统安全外交的目标是共同防止非战争危机的发生与应对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而“多元多边主义”中的“双边行动”的“多边考虑”,以及“多边合作”的“多元考虑”更具有推行的普遍性和决策的优先性价值。或者说,“多元多边”与“多元双边”的合作模式呈现的是“你安全我才安全”的普遍包容的和合主义价值理念,是以中国方式对以往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一种扬弃与超越。

## 二、非传统安全外交对中国的意义

非传统安全外交不仅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着开拓性的意义,而且对全球安全治理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有着导向性的意义。非传统安全面临的安全困境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性安全困境。在全球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一国或多国的资源开发、利用与消耗必然会减少其他国家的资源开发、利用与消耗,所以,非传统安全外交主要是各国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具有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资源性安全困境,并在这一困境的求解中合理地兼顾他国与本国的发展。即使在传统安全威胁不断的前提下,资源安全

也往往成为制约和助推传统安全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源性安全困境引发的风险与威胁,英国选择“脱欧”以“自保”是一种方式,而美国选择“美国优先”或选择拉帮结派建小圈子以“损他”是另一种方式。而中国在世界出现“贫富分化”“政治极化”“文化异化”而形成所谓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中,坚持认为全球化或“再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坚持做出全力参与全球化的努力;坚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sup>[5]</sup>。由此,非传统安全外交对全球治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各国合作应对地区性和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积极尝试,是超越西方传统冷战思维且不以霸权国家为盟主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的积极实践,更是中国所倡导的通过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以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最佳路径选择。

以和谐世界为目标导向,以共享安全为价值准则,以安全共治为实现路径的非传统安全外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凸显其特有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可能性和未来拓展性。

一是历史必然性。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外交智慧。非传统安全外交是一种外交新方略,其外交主体、对象、原则、方式与路径等均突破了以往传统安全外交的局限。非传统安全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方略,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议题大”。超越一个国家的自身考量,以世界的发展为自身发展的前提,以帮助他国的发展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机会,以欢迎他国“搭便车”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发展。第二,“部门多”。超越了传统外交部的经典职能,除了外交部,政府多个部门参与联运,如加拿大专门成立“外交与国际贸易部”<sup>[6]</sup>,美国则有“外事共同体”<sup>[1](P11)</sup>,英国除外交部外设有“内阁办公室”作为“外交—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联合结构”<sup>[7]</sup>,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设有“政策协调委员会”等。许多国家首脑亲自践行非传统安全外交,通过提升

国家形象、推销国家产品、拉动国家经济等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第三,“范围广”。非传统安全外交有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共同为外交发展谋划出力。第四,“影响深”。非传统安全外交关乎联合国的2030年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中国参与的澜湄六国非传统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来消解水资源困境,成为非传统安全外交的重要示范。

二是现实可能性。外交和非传统安全紧密相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务的理论指南<sup>[8]</sup>。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人类社会出现了强劲的逆全球化潮流,使得人类发展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势更趋复杂。在全球要素的加速流通中,当今世界已不再是单一的地理对象,与之相应的人口规模、经济水平和领土面积也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单一性重要力量。一个国家必须在世界的发展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最佳定位,毕竟任何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更多是通过它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水平以及与合作伙伴、盟友建立关系的质量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外交关系的质量可以通过其结交新的伙伴和朋友的综合能力来衡量,而化敌为友的能力越来越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外交能力。

三是未来拓展性。面对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联动式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所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不确定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性、非对称性、不易控性等特征<sup>[9]</sup>,恰恰为国家之间相互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如果各国都能认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必然会成为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许多传统安全设定的目标可以通过非传统安全路径来达成,那么非传统安全外交也将成为双边甚至多边外交的主要方式。非传统安全外交强调在经济安全、文化

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领域推行交流互动、合作共赢的外交方式。事实上,应对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超越传统的安全困境,非传统安全外交都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普遍安全世界的打造,都需要非传统安全外交的助力。传统安全问题涉及比较敏感的主权问题,更多与历史传承、政治变革等因素相关联,具有对抗性与异质性特征,往往成为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僵持性障碍,这就需要通过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来促进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进而解构传统安全问题。

总之,非传统安全外交是一种广义上的外交,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复合性外交,是国家各个政府部门都积极投入其中的整合性外交,也是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以共治形式充分开展的“多元多边主义”外交,要推进全球治理实现普遍安全与共同安全,离不开非传统安全外交的创新与实践。

### 三、非传统安全外交的类型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大力推行非传统安全外交。基于中国外交实践,非传统安全外交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结伴式外交、对接式外交及镶嵌式外交。

#### (一) 结伴式外交

非传统安全外交超越了传统安全外交中结盟的局限性,因为同盟体系的排他性意味着加入同盟体系的国家可能永远属于少数,少数人的安全建立在多数人的安全无法保障甚至受损之上,这种秩序也就缺乏基本的道义基础。结伴式外交就是以面对共同安全威胁为前提,以接触与对话为形式,以安全合作为目的,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安全合作和安全治理<sup>[10]</sup>。

中国的伙伴关系实践创造了丰富的结伴形式,有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全面友好合作的伙

伴关系,还有战略、全面战略、全面战略协作、战略合作、全面战略合作、全天候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些都为各类非传统安全外交的推行提供了新的范式。但是结伴式外交存在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缺乏深度镶嵌,这就需要我们重视结伴式外交的深化问题,至少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可以考虑对接式与镶嵌式外交来实现突破。

“一带一路”建设是结伴式外交的重要体现。结伴式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基础,而“一带一路”建设又丰富和深化了结伴式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中国倡导“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sup>[11]</sup>。同时,中国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sup>[12]</sup>。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寻求和平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倡导开放包容、强调共赢共享”<sup>[13]</sup>。“一带一路”建设是践行伙伴关系的最佳平台。截至 2022 年 1 月,中国已与 147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sup>[14]</sup>。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写入了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成果文件。”<sup>[15]</sup>“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透明的,致力于使更多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大家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涵盖的区域广泛且多为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等大部分区域的安全环境较为复杂,政治动乱等传统安全威胁与恐怖主义、社会冲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海外企业在资本、设施和人员等方面存在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中安全领域的结伴式外交是实现中国和东道国安全互保的最佳方式<sup>[16]</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与东

道国安全部门建立和强化各类双边和多边安全机制,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10+1)等多边安全机制平台的合作,进行国际维和、国际巡航、联合执法等行动来开展军事交流、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跨境犯罪,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同时促进各东道国及区域乃至全球的安全治理。

## (二)对接式外交

非传统安全外交实际上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核心价值观、信仰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当不同文明之间缺乏充分对话或者对话渠道不通畅时,误解和冲突则会随之而来。对接式外交指的是在异质性文明之间架构对话沟通的桥梁,进行相互对接从而实现相互理解。

近些年,中国在对接式外交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如通过中美之间的气候外交来突破气候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虽然中美已经进入到战略竞争的历史阶段,但中国仍致力于建设创新性交流平台,促进中美互信,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期增进双方对共同利益的相互理解,缓解两国紧张关系。中国与特朗普政府开启四大对话机制,包括“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加强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就重大敏感问题增信释疑。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双方在安全和经贸等领域仍然存在显著分歧,但气候合作符合中美双方各自利益,气候外交为破解中美外交困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拜登执政后,气候问题重新进入了美国内政外交的优先议程,美国期待重新发力,重塑其在全球气候议题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与此同时,“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新理念,以中国智慧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sup>[17]</sup>由此,中美在气候安全议题上的外交

互动日益频繁,从2021年3月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到2021年4月双方气候特使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等,在一系列关于气候安全的对接式外交中,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意义重大。习近平强调,“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同时,拜登也表示,双方应就可以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sup>[18]</sup>。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对话为中美气候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2021年11月,中美两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两国将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21世纪20年代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法规框架与环境标准;二是将清洁能源转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三是推动制定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和电气化的鼓励性政策;四是循环经济相关关键领域,如绿色设计和可再生资源利用;五是部署和应用技术,如碳捕集、利用、封存和直接空气捕集。同时,两国还计划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定期举行会议以应对气候危机并推动多边进程,具体行动包括:继续开展政策和技术交流,识别双方感兴趣领域的计划和项目;举行政府间和非政府专家会议,促进地方政府、企业、智库、学者和其他专家的参与,交流各自国家努力的最新进展,考虑额外努力的需要,并评估联合声明和本联合宣言的实施情况等<sup>[19]</sup>。尽管中美双方在气候合作方面存在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的不同解读以及美国气候政策的不稳定性等问题,但是气候外交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也有助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多边共识,从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 (三)镶嵌式外交

非传统安全外交追求“你安全我才安全,我

安全你才安全”的镶嵌式结构关系。镶嵌式外交主要是指行为体对他国或区域的多层次关系网络的嵌入,包括以安全为内容的嵌入、以安全为目的的嵌入、以安全为方式的嵌入等。在嵌入过程中,社会网内的具体情境对行为体希望与谁或能够与谁展开安全互动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并且可以通过促进信息传递、信息交换等互动方式减少安全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此来影响国家安全的实现<sup>[20]</sup>。镶嵌式外交以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为重点。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多元行为体的互助与共治,即使发达国家也有着其自身的脆弱性而难以独立承受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安保压力,如气候变化、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在全球化时代,安全孤立是一种空想,安全自保是一种短视,安全互助是一种必然,安全共享是一种趋势。镶嵌式外交为超越安全孤立和安全自保提供了互助和共享的新路径。

公共卫生外交充分体现了镶嵌式外交的重要性,社会组织和企业积极抗疫的行为,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率先开展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以紧急物资援助为重点与国际社会进行抗疫合作。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国已向 150 个国家和 13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 40 亿件防护服、60 亿支检测试剂、3 500 亿只口罩等大批防疫物资,向 34 个国家派出 37 支医疗专家组<sup>[21]</sup>。同时,中方指导长期派驻到 56 个国家的援外医疗队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积极协助驻在国家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此外,中国还开启以疫苗合作为重点的抗疫合作,截至 2021 年 12 月 26 日,已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20 亿剂新冠疫苗,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之一<sup>[22]</sup>。同时,中国启动周边“抗疫紧急支持计划”,建立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将疫苗和抗疫物资定向投放到巴基斯坦等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周边抗疫防疫安全

带”<sup>[21]</sup>。本次对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力度最大、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中国企业和民间机构,尤其是海外企业和当地华人社团在此次公共卫生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通过与所在国官方直接对话、与双边政府和中国企业进行协调、与当地社区一起积极抗疫等方式,消除当地民众对中国抗疫存在的疑虑和误解,与污名化中国的舆论环境相抗争,获得当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因而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如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肯尼亚政府、中国地方政府以及中国国内制药企业三方之间进行沟通与协调,成功促成肯尼亚获得“中国医药集团”“华北制药”“圣湘生物”等国内大型医药公司捐赠的防疫物资<sup>[23]</sup>。又如,中国石油公司与尼日尔、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所在国的当地政府和社区酋长等核心利益相关方建立了定期沟通联系机制,向所在社区和村落居民分发多语种防疫资料,为当地民众进行讲解,分享中国推广的预防经验,将科学防疫及抗疫知识在当地传播开来<sup>[24]</sup>。

#### 四、结语

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推动着国际秩序的重构,多边外交和全球治理都面临适应这一变革的重大考验。多边主义面临严峻考验,但无法改变多边主义仍是国际合作的主流这一普遍共识<sup>[25]</sup>。中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边合作对于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意义重大。打造一个由“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构成的横跨亚欧非的新治理空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存在着诸多的认同难题与操作困境。由于文明样态不同、社会制度多样、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以及文化宗教多元等结构性差异,国家之间难免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认知冲突、利益争端、文化不协调等。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外交可以作为一种

新路径来促进国家认同,通过结伴式外交实现政治上的和谐式建设,通过对接式外交进行经济上的互补性发展,通过镶嵌式外交拓展文化上的互惠性交流,从而尽可能消解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化解文明冲突。在推进深度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创造更多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外交与非传统安全共同体,提升中国学习世界、参与世界与引领世界的能力。

### [参考文献]

- [1] 赵可金.非传统外交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 赵启正,编.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3.
- [3] 罗建波,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13.
- [4] 余潇枫,王梦婷.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J].国际安全研究,2017(1):4-25,149-150.
- [5]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1/01/c\_1126936802.htm.
- [6] 常云.加拿大贸易服务体系调研报告[EB/OL].http://wwwold.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963/2014/0916/546219/content\_546219.htm.
- [7] [印]基尚·拉纳.双边外交[M].罗松涛,邱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5.
- [8] 杨洁勉.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互动与创新[J].国际展望,2017(3):1-15,153.
- [9]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第3版·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47.
- [10] 戴维来.中国的“结伴外交”战略:特征、缘由及路径[J].现代国际关系,2015(10):30-38,66.
- [11]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30.
- [12]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18-04/10/content\_5281303.htm.
- [13] 王毅:中国将打造更加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0/c\_1120661741.htm.
- [14] 我国已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EB/OL].新华网,http://www.news.cn/world/2022-01/18/c\_1128275918.htm.
- [15] 杨洁篪谈共建“一带一路”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筹备工作(全文)[EB/OL].“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官方网站,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9/0419/c27-1131.html.
- [16] 王梦婷,余潇枫.“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J].国际安全研究,2022(1):49-72,156-157.
- [17] 国务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文)[EB/OL].国新网,2021-10,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15491/1715491.htm.
- [18]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EB/OL].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09/10/c\_1127847695.htm.
- [19] 中美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全文)[EB/OL].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11-11/9606795.shtml.
- [20] 余潇枫,周冉.安全镶嵌: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50-169.
- [21] 大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EB/OL].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http://www.cidca.gov.cn/2021-12/25/c\_1211501472.htm.
- [22] 王毅:中国完成了习近平主席作出的宣示,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EB/OL].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jzbhd/202112/t20211230\_10477265.shtml.
- [23] 王泽壮,匡泽玮.海外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特点及启示——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例[J].公共外交季刊,2020(1):51-55,122-123.
- [24] 张军、钱凤章、李金海.中资企业海外社会安全能力建设与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挑战的实践——以中国石油为例[A]//张蕴岭,张洁,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18-233.
- [25] Kishore Mahbubani.The Asian 21st Century[M].Berlin:Springer,2022:415-418.